

May 2021

On the Edition Criticism of New-Era Novels and Its Academic Value

Xianhai Luo

Follow this and additional works at: <https://tsla.researchcommons.org/journal>



Part of the [Chinese Studies Commons](#)

Recommended Citation

Luo, Xianhai. 2021. "On the Edition Criticism of New-Era Novels and Its Academic Value." *Theoretical Studies in Literature and Art* 41, (3): pp.11-22. <https://tsla.researchcommons.org/journal/vol41/iss3/12>

This Research Article is brought to you for free and open access by Theoretical Studies in Literature and Art. It has been accepted for inclusion by an authorized editor of Theoretical Studies in Literature and Art.

新时期长篇小说版本批评及学术价值论

罗先海

摘要: 学界对新时期长篇小说大量因作家修改或重写出现不同版本的现象关注不够。新时期长篇小说版本生产与实践存在“三个时间段”比较突出的修改现象,其中“实质性异文”多集中于对“涉政”“涉性”问题进行删改及基于艺术完善和时代因素的综合改动。修改动因也迥异于古代和现代文学传统,除政治因素外,文学评奖、商业化、影视改编、版权、地域文化、网络与新媒体以及全球化语境变迁等,是主导文本修改和变异的多因。新时期长篇小说的版本批评对于推动当代文本文献校勘与整理、丰富当代文学研究的问题与方法论意识、倡导文学批评与文学史叙述精准化等方面亦具有重要学术价值,应引起学界重视。

关键词: 新时期; 长篇小说; 版本批评; 学术价值

作者简介: 罗先海,文学博士,湖南大学岳麓书院和文学院联合培养博士后,副研究员,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版本与史料问题研究。通讯地址:湖南省长沙市岳麓区麓山南路湖南大学岳麓书院,410082。电子邮箱:1185054078@qq.com。本文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1978年以来中国小说版本发掘与异文汇校研究”[项目编号:20YJC751017]、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制度研究”[项目编号:18ZDA271]、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第68批面上资助一等项目“中国当代文学版本问题研究及异文资料整理汇编”[项目编号:2020M680111]的阶段性成果。

Title: On the Edition Criticism of New-Era Novels and Its Academic Value

Abstract: Different versions of novels in the new era through the writers' revision or rewriting has not been paid due academic attention. Different versions of novels are produced in three periods particularly. Among these revisions and rewritings, the “substantive textual variants” center round expressions that are politically sensitive or that are concerned with sex scenes. Other changes are made concerning artistic perfection and socio-historical requirements. Apart from political factors, literary awards, commercialization, film and television adaptation, copyright, regional culture, network and new media, as well as changes in the context of globalization, are also contributing reasons for textual modification and variation. Textual criticism of novels in the new era is of great academic value in promoting the collation and indexing of contemporary literary texts and documents, enriching the awareness of problematization and methodologies in contemporary literary research, and advocating accuracy in literary history research.

Keywords: the New Era; novel; edition criticism; academic value

Author: Luo Xianhai, Ph. D., is a postdoctoral researcher in Yuelu Academy and College of Arts of Hunan University jointly trained, associate research fellow, with research focus on the study of editions and historical data of modern and contemporary Chinese literature. Address: Yuelu Academy, Hunan University, South Lushan Road, Changsha 410082, Hunan Province, China. Email: 1185054078@qq.com This article is supported by the Humanity and Social Sciences Youth Foundation of Ministry of Education(20YJC751017), the Major Project of National Social Sciences Fund(18ZDA271) and the 68th batch of general funded first class projects of China Postdoctoral Science Foundation (2020M680111).

新时期以来的四十余年,文学创作的观念与技法、文学作品的主题与风格以及重要的文学思潮和流派等,都得到了及时跟踪和研究。但随着社会政治转型、市场经济变革、艺术审美嬗变、印刷技术以及网络与新媒体等传播媒介变迁,多元因素导致作家修改或重写旧作而出现了不同版本的现象,这种现象较少引起研究者关注。其实,新时期重要作家及其作品版本存在已经成为一个显在学术现象,如韩东、昌耀的诗歌;《傅雷家书》和《文化苦旅》等散文;而小说版本修改与文本演变现象相较其他文体则更为突出,涉及版本变迁的中篇小说有《爸爸爸》(韩少功)、《高山下的花环》(李存葆)等,中篇改扩成长篇的有《活着》(余华)、《金陵十三钗》(严歌苓)、从《传说之死》到《旧址》(李锐)、从《凤凰琴》到《天行者》(刘醒龙)等,更重要的是大量长篇小说如《沉重的翅膀》《第二次握手》《芙蓉镇》《将军吟》《白鹿原》《心灵史》《暗算》《丰乳肥臀》《一个人的战争》《繁花》《琅琊榜》等都存在不同版本变迁现象。本文尝试以“版本批评”作为问题和方法,在对新时期以来大量长篇小说进行系统化版本发掘、汇校整理的基础上,将偏于史料考据的版本视角与偏于阐释的文本批评相结合,梳理新时期长篇小说的版本生产与实践,分析版本修改动因及文本变异,并尝试探讨“版本批评”的当代学术价值等,以期为新时期文学特别是长篇小说研究提供新的路径和方法。

一、新时期长篇小说版本生产与实践

新时期长篇小说诞生与修改及其传播接受的命运,受当代文学历史化研究局限及批评观念影响,长期以来几乎处于被忽略状态。其实它也是漫长文学文献问题研究的重要一环,甚至因时代语境变化正衍生出版本研究新的学术问题。古典文献研究非常重视版本考证与鉴定,这种治学路径和方法与古代典籍较为单一的传播方式有关。现代长篇小说受政治环境及报纸、期刊和书籍等出版物影响,也出现大量伪装本、删节本甚至作者亲自“操刀”的修改本。随着时间推移及现代文学史料研究的深入,这些长篇小说的诞生、出版及在传播过程中的再版与修改命运,都已引起越来越多学者的关注,甚至已经出现不同于古籍版本

学的“新书版本学”倡导。^①而“当代是文学作品版本密度最大的时代,由于政治形势、出版机制、文学观念等的不断改变,许多作品都被不同程度地修改,导致版本的变迁,使中国当代文学成为一种拥有众多不同版本的文学样态,这是中外文学发展史上一种十分奇特的现象”(金宏宇,《当代文学》7)。

对当代文学版本与修改问题的研究,迄今也存在发展阶段不平衡现象。总体来说,新中国成立后三十年间,也就是20世纪50年代初至70年代中后期,当代文学版本与修改问题颇受关注。这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是现代经典长篇小说诸如《子夜》《骆驼祥子》《家》《倪焕之》等,进入新的政治与时代语境后所作的集体性跨时代修改;二是伴随新中国成长起来的作家所创作并体现“国家意志”的长篇新作,诸如《创业史》《金光大道》《茫茫的草原》《野火春风斗古城》等,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随着政治形势突变及文学观念变化而出现了作品修改及新版问题。这时作品版本变迁多受制于政治潮流导向与外部批评压力,作家为适应新的政治形势而修改作品,但也因此留下了损伤作品艺术价值的缺憾。20世纪六七十年代文学生产、出版、传播与批评更是被整合进国家政治潮流,文学文本俨然成为政治文本,“改写”自然更是迫于政治压力。因为当代文学前三十年政治对作家与文学的影响,且文学历史化研究问题近些年来颇受重视,这一时期文学版本与修改实践问题渐入研究视域。

新时期以来的四十年,由于政治松绑,文学创作环境不断优化和改善,以及以市场化为代表的商业意志介入和以技术化为趋向的新兴媒介(网络 and 新媒体)干预,长篇小说出现了大量修改、再版与改写问题。尽管这些版本现象还未最终定型,但已经显现出在传播接受过程中,与政治环境、市场商业、文学体制、社会风尚、阅读心理、地域环境甚至新兴媒介转型之间的胶着关系。种种迹象表明,现在的版本研究“在继承传统版本的基础上有必要建立一套新的原则与规范,简单照搬乾嘉学派版本校勘的思维、理念与方法,恐怕很难对当代文学版本及其生成历史与原因做出有效的阐释”(章涛 吴秀明,《当代文学》128—129)。但事实上,学界却少有人着力搜集和梳理新时期长篇小说版本变迁及谱系目录,更谈不上

对文本演变内在规律和核心问题进行深入研究。究其原因,既在于其时间切近而不易被研究者“学术化”,更与学界把新时期长篇小说研究作为当前文学“重批评化”而“轻历史化”的倾向有关。笔者辑录并整理新时期重要长篇小说主要修改情况后,发现大量作品存有版本变迁现象:20世纪80年代主要作品计有《第二次握手》《将军吟》《沉重的翅膀》《芙蓉镇》《皖南事变》《金草地》《天堂蒜薹之歌》《穆斯林的葬礼》等;20世纪90年代计有《心灵史》《旧址》《活着》《白鹿原》《最后一个匈奴》《天行者》《骚土》《一个人的战争》《丰乳肥臀》等;21世纪以来计有《暗算》《繁花》《狼图腾》《金陵十三钗》《因为女人》《风雅颂》《日夜书》《推拿》《饥饿的女儿》《大清相国》《废都》《悟空传》《张居正》《琅琊榜》等。从中发现新时期作家初次修改作品存在“三个时间段”比较突出的现象,且每个时段修改、再版动因及倾向也各有不同。

一是新时期初1979年至1981年的集中修改期。新时期初处于“极左”思潮向思想解放运动转轨的历史语境,作家受思想解放潮流影响,创作中难免“大胆”控诉,但这一解放过程却并未全部完成,意识形态对文化及文学的“管控”仍处于“刚柔并济”的过渡状态。当作家“越界”创作威胁到新时期初的文化领导权时,被迫或主动修订便成必然,如《沉重的翅膀》初版本对初刊本中大量“越界”或过于偏激的政治敏感言论,或部分涉及宿命色彩的议论进行了删改。《沉重的翅膀》发表后,张洁虽在各种学术场合收到过友好批评与修改建议,但这些友好批评与建议更多地却被随后严厉的政治批评所代替,其中“北京市委和中宣部对这本小说的批评意见多达一百四十余条,有的批评很严厉,意见上纲到‘政治性错误’”(何启治57)。面对苛责与批评,不仅作家要被迫作出修改,编辑也会参照当代出版审查机制进一步督促甚至要求作家进行必要改动。此外,《将军吟》初版本也删除了大量涉及政治事件或人物过激言辞的话语;《芙蓉镇》初版本删除和修改部分涉及意识形态议论和描写内容等。这些作品改动,在某种程度上是作家为保全作品或少受苛责而做出的妥协行为,是新时期初意识形态作为隐形文化权威对文学介入和干预的表现。

二是20世纪90年代初中期1992年至1997

年的集中修改期。1990年代后经济体制的市场化变革,几乎改塑了整个社会和国民的生存方式与思维观念,身陷市场化浪潮的新时期作家,或主动迎合市场需要进行创作,或被动迫于市场化压力进行改写,从而出现90年代初中期长篇小说的集中修改现象。林白《一个人的战争》的初版本比较典型,出版商在没有征询作者意见的情况下,擅将作品进行商业包装和市场化运作,不仅对标题、封面等副文本因素进行了刻意低俗包装和推广,而且在正文本中新增了不属于原作,但却含有大量女性私密叙述的第五章内容,造就了一个作者很不满意的新版本,以致林白认为这个版本“被庸俗包装,封面不堪入目,内容错漏百出,我至今不愿意承认这一版本”(林白239)。老村《骚土》的初版本,也是由于当时作家生活困难而不得不将书稿交由书商进行市场化运作,结果出版商为了迎合大众市场,将其完全打造成一部地摊文学的庸俗之作。

三是21世纪以后的常态化修改期。21世纪以后的常态化修改期,不同于20世纪八九十年代出现的集中修改期,以一种不断线,且较为平稳的趋势一直延续至当下。这种现象打破了版本学研究固有的常规思维,认为作品版本,尤其是经典典籍版本与修改必须是较长时段传播与接受的产物,当前文学因时间切近、不具备版本变迁因素而不值得研究;同时也充分说明了21世纪长篇小说版本生产与实践的多元和复杂。除传统政治和市场因素外,商业、影视、版权、地域文化、网络与新媒体以及读者批评等多元复杂因子,都会纠缠并影响21世纪作家对原有文本进行增删修订,从而导致不同版本现象。这些大都是文学版本研究在21世纪以后出现的新情况与新问题,值得跟进关注和研究。

新时期长篇小说修改本还呈现出另类罕见的改动现象——修改时间跨度非常长,修改文本容量非常广,甚至大范围改写或重写,这在古今中外文学版本与校勘研究史上也并不多见。从创作到修改定稿,跨度时间最长是张扬的《第二次握手》,前后跨度近半个世纪之久(49年),且一直处于重写和修改状态;王蒙的《这边风景》从创作、发表到修改定稿也经历了三十余年时间;张承志的《心灵史》从初版本到改定版也经历了二十余年时间等。就文本修改量而言,新时期长篇小说

也不同于古籍和新文学版本修改。有的是中篇改成长篇,如余华的《活着》,其初刊本是一部不足7万字的中篇,而初版本却被改成近12万字的长篇;严歌苓的《金陵十三钗》、李锐从《传说之死》到《旧址》、刘醒龙从《凤凰琴》到《天行者》等都属这类改动。有的则是大篇幅重写,如《第二次握手》,作者干脆将2006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修订出版的本子称为“重写本”,也由初版本25万字修改为重写本61万余字,文本修改量近36万字;张承志则将修改后的《心灵史》称为“改定版”,文本修改量达全书篇幅的三分之一;麦家《暗算》修订(增补)本中,将黄依依的故事一章“有问题的天使”进行大幅增补和重写,使原书尽增6万余字。这些大篇幅的文本修改与增写量,既为新时期长篇小说版本汇校与文本演变研究提供了丰富的异文素材,同时也折射出新时期作家所经历的社会文化及艺术心理嬗变情况,成为研究作家作品及社会文化思潮演变的重要切入口。

二、新时期长篇小说的异文修改倾向

以上所述是不同时段长篇小说大致修改现象,实际上,某部作品的完整修改过程可能跨越几个时段,或兼有多种现象。每次修改可能既有相同缘由,亦有不同因素影响,从而导致新时期长篇小说修改的复杂性,这种复杂样态只有通过具体作品不同版本修改异文的具体汇校及展示才能清晰陈述。从所汇校并整理的“实质性异文”来看,^②对“涉政”“涉性”问题的删改及基于艺术完善和时代因素的综合改动等是新时期长篇小说共有的修改倾向。

首先是对某些涉及政治的敏感言论或过激叙述进行删改。文学与政治的关联问题一直是当代文学的常谈话题,新中国成立后就有不少长篇小说因涉及阶级、政策、路线等政治问题而受批判,被禁或修改也是因为政治问题。“当时,‘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口号的提出、对刘少奇路线的批判、与苏联的断交等等政治性事件直接影响着长篇小说的修改。”(金宏宇,《中国现代》23—24)《茫茫的草原》、《创业史》(第一部)、《欧阳海之歌》、《青春之歌》以及《红旗谱》等“十七年”长篇小说名作修改本,都有关于政治问题的删改。新时期以后创作与评论自由的双原则虽给文学进行了松绑,政治对文学管控亦由台前退到幕后,但

这并不等于放弃对文学的领导权。不同于“十七年”文学作品的政治问题涉及当时重大政治事件或人物,新时期以来长篇小说大多因作家追求言说主体自由和空间,在控诉姿态中涉及对政治形势或体制的“越界”批评,与隐性文化领导权威产生冲突和抵牾,而被要求作出合乎意识形态规范的修改。张洁《沉重的翅膀》从初刊本到初版本,再到修订本的“一改再改”,均涉及了对政治意识形态的“越界”叙述与批评。莫言《天堂蒜薹之歌》初版本也删去了对时政问题的议论,还通过更改题记内容和署名,达成修改后文本与政治关系的疏离,甚至不同版本标题的修改及回改过程,也体现出莫言对文学与政治关系的进一步思考。^③陈忠实《白鹿原》修订本最终获“茅盾文学奖”,对国共两党政治斗争的见解进行适当修改和廓清就起着关键作用。总之,新时期长篇小说的政治“驯化”修改,虽然并不影响作品整体框架,但原作的内涵丰富性及艺术批评锋芒都有所减弱,是以艺术形式损耗达成符合意识形态规范的“驯化”文本。

20世纪90年代后诞生的长篇小说修改本往往还对作品中的“涉性”叙述大加删改。新中国成立后三十年间,长篇小说普遍存在洁化叙事倾向,“这个时期的长篇小说真正是耻于写‘性’,少数作品即便写到‘性’,那也多半只是反面或落后人物身上才有的特‘性’”(金宏宇,《中国现代》22)。长篇小说修改本对“涉性”叙述进行集中删改的现象是从90年代开始的,主要原因则是90年代后作家们已经拥有更多创作自主权,可以将艺术思考融进更深更广的生活场域。但随着长篇小说传播与接受范围进一步扩大,出版审查及教育导向等因素制约,迫使作家不得不对这种大胆、开放的性叙述进行洁化改动。林白在《一个人的战争》再版(删节)本中,将自己十分钟爱的题记内容中较直露、女性对自我凝视和性幻想的叙述悉数删去,此外还对文本中涉及性描写和性感受的叙述部分也作含蓄修改,作家之所以“忍痛割爱”进行改动,实则是为争取作品再版而作出的妥协。陈忠实《白鹿原》初版本参评“茅盾文学奖”后,也被评审委员会告知必须对“较直露的性描写加以删改”(王得后,《世纪末杂》167),随后在《白鹿原》修订本中,作者也遵从评委会意见,对田小娥与黑娃、鹿子霖等的过度性描写进行必

要改动。而《一个人的战争》中的“涉性”叙述,在艺术上能传递出女性个体生命体验应有的张力和锋芒;《白鹿原》对田小娥的“性”描写,也能很好地表现其敢爱敢恨和复仇的性格及形象。修改本这种删减,无疑会削弱文本艺术内涵的表达,人物形象塑造及性格阐释也会产生一定偏差。

新时期长篇小说基于艺术完善和时代因素的综合改动,也是不少修改本的普遍追求。相比“十七年”长篇小说,要么是解放前现代长篇小说名作跨时代、跨历史语境的修改;要么是解放后在“极左”思潮干预下的政治性修改。新时期小说家因获得更多创作自由,对文学创作精益求精的艺术追求,自然成了新老作家创作与修改的愿景。如《第二次握手》初版本,本来其情节结构及人物形象塑造就已定型,但张扬时隔数十年后修改,仍不忘在重写本中,对主要人物苏凤麒、丁洁琼、叶玉菡等进行艺术完善与改动,而其中苏凤麒是重写本中改写幅度较大且较为成功的主要人物之一。重写本不仅延续初版本中的人物画廊,而且作出更富人性深度和真实性的艺术修改与探索。张洁耗费大量精力、时间去走访、体验和搜集创作素材,在《沉重的翅膀》修订本中主动对情节结构和人物形象重塑作出合乎艺术完善的主动修改。林白在《一个人的战争》多版本修改中一次次修订,一次次复原,为的就是让作品艺术上变得越来越完整。《繁花》在从网络稿本向纸质版本的转变中,金宇澄不忘对字、词、句修改润色,对语言改动加工,甚至对历史场景和细节也有修改增加等,这都是为了呈现出一部艺术上精益求精的修改本。从迫于政治压力的修改到追求艺术完善的自主努力,体现了新时期小说家创作与修改过程中主动性与从容状态的转变,也体现出长篇小说不断向本体回归的艺术倾向。

应说明的是,编者或作者一般都没有在修改本中,对这些比较明显的修改现象和文本修改量进行直接说明,这就很容易误导读者或研究者将多个版本混淆为同一版本。不过,新时期以来部分作品用类似“重写本”“改定版”“增补本”等字样标示新版本的修改提示,也为文本汇校和版本研究提供了有益线索和依据。当然,最终要详尽掌握不同版本的修改及其差异,唯有通过多版本间异文汇校来判定。

三、新时期长篇小说修改多因及文本变异

新时期长篇小说版本存在已经成为显在学术现象,也出现版本难以搜集、辨认和整理研究的新问题。张洁《沉重的翅膀》就有四个不同版本,陈忠实《白鹿原》包括手稿本也有四个版本,余华《活着》至少有两个版本,张承志《心灵史》有两个版本,林白《一个人的战争》有七八个不同版本,麦家《暗算》有四五个不同版本,莫言《天堂蒜薹之歌》也有四五个不同版本,金宇澄《繁花》在短短四五年间也出了四个不同版本,张扬《第二次握手》正式出版就有三个不同版本,加上手抄本的话,差不多有近十个不同版本等。就修改动因而言,新时期长篇小说修改既与传统经典古籍因时间久远和传播流散而造成版本差异不同,也与现代长篇小说受政治环境影响而出现伪装本、删节本有别;影响新时期作家作品修改与再版的动因更为复杂和多元,除传统政治因素外,文学评奖,商业、影视等市场化运作,网络与新媒体,地域文化、版权以及全球化语境变迁等是主导文本修改和变异的多因。

文学评奖是推动新时期长篇小说生成、修改及再版的柔性体制因素。对不同体裁的文学作品分类进行全国性评奖始于新时期之后,^④这与国家层面要改变过往意识形态领域批判与斗争的思维模式有关,愿意选择更具引导与鼓舞力量的文学评奖作为隐形扶持、鼓励与柔性管理策略。学者张丽军在研究文学评奖与新时期文学经典化问题时也有分析:

正如福柯、布迪厄等人对文化艺术场域的分析一样,当代政治意识形态以一种更加隐蔽、有效的方式参与文学艺术的生产、传播与接受,实现着文化领导权的潜在存在。就新时期中国文学场域而言,文学评奖就是一种在新的文化政治语境下实践文化领导权的积极有效形式,是党和政府通过作协等中介机构来引领文艺的、具有新质的政治实践,也是从单一粗暴干预文艺的专断式向专家式、科学性的现代性转型。(张丽军 27)

从新时期文学生产及经典遴选来看,中国最具权威也是长篇小说专业奖的“茅盾文学奖”,无疑对新时期长篇小说生产、传播、改写与再版及其经典化,起着潜移默化的重要影响作用。“在中国的文学奖项中,茅盾文学奖的影响最大,对作家最具有诱惑力,其价值导向对于作家的改塑也最为典型,也确实催生了不少为获奖而写作的长篇小说。”(黄发有 166)能够参评并最终获得“茅盾文学奖”,不仅意味着作家及其作品得到主流认可,背后象征资本更会随着大奖光环不断累积,出现“茅盾文学奖”评选中或主动或被动为获奖而修改的情况,甚至有学者将“茅盾文学奖”作品的修改案例直接称为“获奖修订版”(吴秀明 章涛,《“获奖修订版”》78—89)。

《沉重的翅膀》是20世纪80年代“茅盾文学奖”评选中因修改而获奖的代表性案例。其获奖文本不是1981年初版本,而是1984年再版本(修订本),参评并获奖的经历可谓一波三折。更耐人寻味并体现“茅盾文学奖”作为柔性体制性因素干预且介入长篇小说生产与经典遴选的,是1981年《沉重的翅膀》初版本曾参评首届“茅盾文学奖”并入围终评,但最终还是被“拉下”来,1984年经过重新修订后的再版本参评第二届“茅盾文学奖”才最终获奖。为什么同一部作品非得经过修改并时隔几年之后才能获奖?这背后折射出“茅盾文学奖”作为新时期文学建构并发展起来的柔性文学体制因素,随着政治与社会语境宽松而不断自我修正、调整的努力意图。20世纪90年代的《白鹿原》也必须作出小范围修改才能获得第四届“茅盾文学奖”,这次评奖过程据说非常艰难,其中核心难题就聚焦在《白鹿原》。倒不是因为《白鹿原》艺术水平低劣,相反,评委会一致认定《白鹿原》是当代文学不可多得的精品力作。在评委会艺术法则里,不是《白鹿原》够不够得上“茅盾文学奖”艺术水准的问题,而是作为中国文学最高奖不能缺少《白鹿原》这样的力作。专家评委觉得“非评不可”,但设奖的意识形态主管部门却认为“有问题”,不同意评奖。“问题”直指两点,一是其中政治问题,二是性描写。“评与不评”背后是新的时代语境里艺术准则与政治标准的博弈问题。为了既维护“茅盾文学奖”作为国家文学体制的权威,又不错失《白鹿原》以留下艺

术遗憾,最后评委会选择了“修改”的折中方案,以促成难题和解。尽管陈忠实后来在与张英的访谈中不承认这种修改方案:

没有人直接建议我改写,我不会进行改写,那是最愚蠢的办法。我知道过去有人这么做过,但效果适得其反,而且《白鹿原》在读者心目中已经有了基本固定的印象,后面再改也很困难。(张英 205)

不管是主动抑或被动修改,事实上最后公布的“茅盾文学奖”名单并非当时已经参评的初版本《白鹿原》,而是并没有问世的《白鹿原》(修订本)。随后在作者和出版社共同努力下,“修订本”很快推出,较初版本而言虽然改动不多,一共也才2000余字,但都是围绕着评委会提出的“政治”与“性”问题进行的修改。这场“评与不评”的争议,作家(也包括评委会)的艺术妥协换来了文学体制让步,既是文学遭遇政治不可避免的问题,也是文学体制随着社会语境变化而不断自我修复和进步的表现。

商业和影视是促进新时期长篇小说文本修改与版本变迁的市场化因素。新时期文学体制能不断自我调整 and 改塑,重要原因就在于政治与社会氛围的变化,最突出的莫过于国家层面“政治中心”向“经济中心”的逐步过渡和转型,新时期以后长篇小说引人注目的现象就是市场化倾向,这也影响着长篇小说的生产与修改。经济压力不断盖过政治压力,成为影响作家创作或修改不可忽视的因素,没有市场支撑,再好的作品也可能因没有出版商关注而成为“抽屉文本”。在出版商、影视化等商业和市场因素干预下,作家或主动迎合市场需要进行创作,或被动迫于市场化压力进行改写,从而出现长篇小说的修改和再版现象。

出版商是市场化文学生产过程中不可忽视的群体,不仅通过策划市场化选题影响长篇小说生产,甚至在作家完成作品后,还对作品进行市场化包装和推广。与评奖过程中政治问题造成作品修改不同,出版商的市场化行为,往往因商业化和世俗化过度泛滥,掩盖或扭曲作品原有艺术价值,从而造成作品修改和文本演变的新问题。中国当代女性主义文学代表作《一个人的战争》及其版本

演变,就与文学市场化浪潮中出版商的过度介入相关。作家林白至今不承认《一个人的战争》初版本存在,在各种场合都不愿提及甚至刻意抹去该版存在的事实,^⑤其中原因则主要源于对出版商肆意包装和炒作初版本的不满。在20世纪90年代后的文学创作领域,市场经济是作家在创作过程中不得不面对和处理的一个决定性因素,他们甚至也必须面对市场经济时代“生存还是毁灭”的艰难选择。

影视化改编也是市场经济浪潮中导致长篇小说修改本出现的重要因素。文学作品被导演看中并被搬上银幕/荧屏,作者再根据电影或电视剧改编的脚本(剧本)进一步修改再版,是新时期长篇小说版本生产不可忽略的动因。严歌苓《金陵十三钗》原本在文体归属上并非长篇小说,而是连载于2005年第5期《小说月报·原创版》上的中篇,后因导演张艺谋看中,并邀请作者参与《金陵十三钗》电影改编(当时第一编剧为作家刘恒,严歌苓为第二编剧,但严也肯定参与其中并对定稿进行了首肯),在为此创作电影剧本时,作家加入了大量史料和细节信息。后来严歌苓又在电影剧本版基础上对作品进一步润色,修改并加工成长篇小说,并于2011年将新版长篇《金陵十三钗》初刊于《当代·长篇小说选刊》第4期,并在文末附创作感想《悲惨而绚烂的牺牲》,后由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有限公司于同年推出单行初版本。通过电影剧本改编和再一次修订重版,长篇小说《金陵十三钗》与中篇版和电影剧本版既有关联,更有了差异,譬如长篇版续写了十三钗最后的命运与多年后相遇,这是电影剧本里所没有的。余华《活着》改编与版本变迁与《金陵十三钗》类似,都源于电影改编需要。《活着》长篇与中篇相比修改较大,增加了大量历史化叙述内容,且女主人公家珍出现“后死”的情节修改,其实都是源于导演张艺谋对于剧本改编的意图与需求,遵循的是“影像表现伦理和逻辑”(罗先海,《跨媒介叙事》215—223)。为了影像表现需要,改编过程中有时也会对原作进行主要人物的重新设定和修改,如麦家的《暗算》,铁院长这个主要角色初版中并不存在,但因作者亲自参与改编的三十集电视连续剧《暗算》剧本中,需要增加这样一个人物和角色,电视剧《暗算》播出后又引起极大反响,其收视率非常高,传播度非常广。为了维护影像传播

连续性,作家后来修订时都保留了类似修改,从而造成了文本变异。以往研究总认为影视改编是对文学的依赖和模仿,但由改编“反哺”文学修改和再版的案例,也进一步昭示出文学与影视的多元、复杂和融合关系。

网络媒介兴起则是影响21世纪长篇小说修改和版本演变的新因素。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至21世纪以来,长篇小说创作与修改除受过往政治因素干预和市场化侵袭外,还经历着前所未有的网络媒介及新媒体传播的生产与影响。再用过往政治与艺术或艺术与市场化等单纯二元分析,概括21世纪前后长篇小说的版本生产与实践显然捉襟见肘。网络新媒体的出现,不仅是书写载体(媒介)的新变化,背后更是创作方式与理念、资本力量、读者接受及意识形态等复杂因素的同步更新与角力。网络文学同样存在修改与异本问题,但当前却较少受到研究者关注。这固然与时间上过于切近相关,更与网络文学不同于传统文学的特殊生产与传播机制紧密关联。网络写作的便捷性,使得作家随时可以修改作品并即时发布,无需严格的编辑审查和付印出版,网络作家每次修改都可产生新版本。当然,网络文学修改的随意性也导致很多网络文学版本难以考证和计数。此外,也可能出现因网站编辑修改而产生的异本,出现因读者和“粉丝”网民续写而产生的伪版本;还有一些作家会在网络上删除其写过的作品,因为没有付印出版,一旦删除便无从寻觅,于是就产生了网络文学“潜版本”等问题。加之网络写作篇幅越来越长,网络文学时代版本考证、搜集与汇校问题比“纸本时代”就更为复杂。尽管如此,网络文学时代不少作品版本谱系与文本演变仍呈现出有迹可循的清晰线索。金宇澄《繁花》的版本修改与实践是兼有网络与纸本时代“网-纸”互联特征的典例,《繁花》最早是网络媒介产物,2011年5月作家在上海本土网站“弄堂网”首次开写,此后每天几百到几千字不等不间断“续更”,连续“更”写5个多月,最后完成33万字有余的初稿《上海阿宝》,这就是《繁花》最初通过网络载体生产和连载的具有“草稿”性质的网络初稿本。2012年8月作者将网络版《上海阿宝》删减2万余字,并进行必要润色和修改后,更名为《繁花》并初刊于《收获》杂志长篇专号,为了保持正式出版物的书面性与严肃性,文本中大量删除了网络

版作者与不同网友及文本角色的对话。2013年,《繁花》由上海文艺出版社推出了较初刊本净增5万余字的初版单行本;2014年,上海文艺出版社再次推出增补了2万余字附录的精装再版本。《繁花》从网络生产向纸本衍生,已经呈现出较为清晰的版本谱系,但目前,鲜有学者从网络文本诞生角度对其进行研究,除了作者本人多次在访谈或自述类文章中提及网络创作及修改经历外,《繁花》“网-纸”互联的版本生产与实践及其产生的学术新问题,仍鲜有研究者关注。^⑥此外,网络小说早期代表作《悟空传》以及网络文学热门IP《琅琊榜》等也都是具有清晰版本迁变谱系的作品。网络文学版本与修改理应成为当代文学批评与学术研究的新问题,启示着我们既要持续跟进并关注当代文学尤其是新时期准经典作品版本修改现象,也不能忽视网络文学历史化及经典化过程中存在的版本与修改问题。同时,随着网络技术的更新换代和升级,网络初稿本搜集、整理与保存工作在当下也显得尤为重要。更重要的是,当传统作家手稿逐渐被电子文本或网络稿本替代后,电子化时代网络稿本“类前文本”的独特价值也应引起学界关注。

版权和地域文化因素一定程度上也催生着新时期长篇小说的版本生产。随着新时期以来法制的健全,公民个人和出版机构法制意识日益完善,版权因素也成为一种特殊的介入长篇小说版本生产的助因。海外华文女作家虹影及其部分长篇小说非常典型。其国内版《英国情人》,原名为《K》,因陈小滢女士状告成为中国法庭首禁小说的案例,后作家虹影对文中富有争议的人名和地名,以及与历史文化人物紧密关联的背景和环境描述等进行了修改,时隔多年后易名为《英国情人》,并由春风文艺出版社推出修改本。作者也曾在修订时交代:

这本小说改得最少,想得最多,仿佛一提笔,所有文字就在那儿。都知道这本书以前叫《K》,国内最早版本是花山文艺社出版的,也都知道被长春法院禁掉,也就有了法院同意出的春风文艺社的《英国情人》版本。(虹影 修订说明)

虹影另一部长篇《饥饿的女儿》也曾因修改出版

而惹上了版权官司。作家及其作品所经历的版权风波,造成作品修改和版本变迁现象,昭示出新时期长篇小说版本生产的复杂性。

地域文化差异也会促成新时期长篇小说的跨语境修改。这主要表现在新时期作家经常在大陆、台湾出版同一作品,由于海峡两岸意识形态和文化差异,作家在不同地域出版作品经常会依据读者对象差异,做出从结构到内容的修改,从而造成不同语境下的文本变异。较为明显的是因意识形态不同而催生修改和变本,如上文提到的《饥饿的女儿》和《K》,台湾首发版中涉及“大跃进”“上山下乡”“文革”以及“三年困难时期”等描写和议论,这些政治越界内容在大陆出版过程中,都不同程度地遭到删改处理。其次,文化氛围和阅读习惯不同,也会导致作家根据不同文化语境进行修改,韩少功《日夜书》就进行了跨语境的改动和出版。《日夜书》由上海文艺出版社转向台湾联经出版社推出繁体新版时,作家考虑到台湾文化语境读者对中国当代史并不一定熟悉,可能无法了解中国当代知青群体所处的时代环境,难以把握和洞悉社会剧变过程中主要人物命运的起伏。最后,作者从结构到内容上都对台湾版《日夜书》进行了适当修改,使台湾版可读性与可理解性大大增强。不同地域读者的知识储备和文化背景,会导致作家修改作品并导致不同版本文本变异,《日夜书》的台湾版体现了跨文化修改的必要和可能。

21世纪以来的全球化语境也会反哺并促成长篇小说文本修改。21世纪以来,中国国际地位不断提升,中国文学作为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重要内容在国际舞台上发挥着重要影响力,走向世界的文学由于脱离地域文化环境,以更为宏观的国际视野来考察文学作品,不可避免地会对自身存在的民族主义倾向有所反思和重估。张承志《心灵史》和姜戎《狼图腾》的改写和重构等体现了这种变化。张承志对《心灵史》修改,源自对当下强调国际竞争时代语境的深切体验,《心灵史》初版本中较为片面地宣扬民族内部矛盾,对21世纪以来国家安定团结和民族共生不利,也违背了新时代语境中鼓励多民族共生共荣的发展愿景,所以《心灵史》改定版对此作出了大幅修改。青年学者李松睿曾在对读新旧版《心灵史》后认为:

在《心灵史》出版后,张承志没有停止自己对哲合忍耶的关注,而是继续搜集相关资料、走访各地教坊,并结合自己在这时期获得的全新视野,重新思考哲合忍耶的意义,花费3年多的时间完成了对《心灵史》的大幅度修改,最终于2012年推出了改定版《心灵史》(以下简称改定版)。如果说《心灵史》[初版本]集中表现了张承志于八九十年代之交,对哲合忍耶在历史上遭遇的磨难、压迫与不公的思考,那么这部作品的改定版则是在中国崛起、经济全球化、宗教极端主义甚嚣其上等历史语境下,对哲合忍耶的价值进行反思。(李松睿 73)

因此,21世纪以来中国文学版本研究,也必须关注世界语境下民族主义倾向问题,这也是版本修改和文本变迁的复杂多因。

四、新时期长篇小说版本批评的学术价值

新时期长篇小说已经出现修改频繁、修改量大且修改动因复杂的客观存在事实,其版本生产与实践已经成为亟待引起重视的学术现象。对这些因修改而产生不同版本的重要作家作品,及时进行版本源流考证、异文汇校整理及文本演变分析研究,理应成为当代文学研究的重要环节和支撑工作,具有独立的学术价值。

首先,可推动当代文本文献校勘与整理。从事版本批评的基础性工作就是开展不同版本间的异文汇校,并对所汇校异文进行归类整理和分析。新时期长篇小说版本批评完整工作的一个基本目标,就是希望以校读记或汇校本成果形式分类呈现大量修改异文。这些异文大多是深藏于同一作品不同版本中未曾揭示的文本“秘密”,以“版本批评”作为问题和方法,对新时期长篇小说进行文本细读或重读的汇校实践,能为开展作家或作品研究提供新的一手异文资料。异文汇校实质上就是文本整理和校勘过程,传统古籍整理其实也是以文本整理为主,构成了传统文献学研究的重要内容。对于现代文学文本的整理,学者王风根据现代文本独立属性并结合自身《废名集》编校经验,专门提出了“现代文本文献学”(王风 45—

64)问题。尽管相对于古籍整理而言,现代文学文本的整理工作还没有得到大规模清理和开展,“现代文本文献学”作为现代文学史料学的分支也并未完整构建,但现代文学文本整理伴生着作家作品及其经典化研究也出现了一批代表性成果。《〈鲁迅全集〉校读记》《〈女神〉汇校本》《〈文艺论集〉汇校本》《〈棠棣之花〉汇校本》《〈死水微澜〉汇校本》《〈围城〉汇校本》《〈边城〉汇校本》《穆旦诗编年汇校》等就是其中的代表。随着现代文学文献学学科构建的呼吁,相信现代文学文本整理工作会得到逐步推进。相较于现代文学文本整理工作的启动和推进,当代文学文本校勘和整理工作目前却少有公开出版成果,仅有龚明德《〈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修改笺评》一书可算此列。此外,作家柳青的后人刘芳芳女士已完成《创业史》汇校,2018年第2期《现代中文学刊》已刊出署名文章《〈创业史〉汇校本说明》,并附《〈创业史〉第一部第三十章汇校》案例,相信《〈创业史〉汇校本》也会很快出版。但新时期文学文本校勘和整理问题鲜有学人涉足,包括长篇小说在内的文学汇校本或校读记成果更是未见公开出版成果。新时期长篇小说,尤其是重要作家作品版本汇校与文本整理,已经成了亟待引起重视的学术实践问题。很多当代作家不太重视手稿或修改稿留存,出版机构也忽略初版本档案保管,甚至网络时代后电子初稿本早已消失难觅,不同版本搜集和文本整理工作很难完整进行,版本汇校亟待开展。新时期重要作家作品的版本演变也主要不是限于个别文字歧义,而更多地涉及人物形象延续、增加或重新塑造,情节、命运改写,作家创作态度、立场变化等。对这些新时期文学文本进行汇校和整理,其成果运用,既可以成为学术研究的一手异文资料,还能进一步探讨不同文本修改与涉及的评奖机制、市场运作、商业因素、地域文化、体制干预、网络媒介以及作家自我艺术完善动因之间的复杂关系。如果能在作品定稿后出版汇校本(或者是校读记)成果,更能为专家学者或普通读者提供易于流传和共享使用的文本文献资源。对新时期长篇小说开展必要的版本批评,首先就要重视对包括新时期文学在内的当代文本进行文献校勘、整理。而且,这种汇异性校勘,更关涉一些核心理论和操作问题,如底本及校本选择,两种异文,作家意图和权威,以及结合异文研究版本演变

的特征、规律和核心现象,尤其是网络媒介变化带来的版本新变问题等,都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其次,可丰富当代文学研究的问题与方法论意识。在当代文学研究领域,文学批评或曰文学评论一直占据主导地位,它因贴近文学现场而容易引起学术关注,过去在方法论选择上更倾向于引进或移植西方各种现代或后现代主义文学观,以此作为解读本土文学思想资源。但近来这种“向西方看齐”的方法论选择却逐渐陷入理论先行或过度阐释的怪圈而受人诟病。鉴于此,越来越多的学者呼吁“文学批评回到文学本体”的理论命题,^⑦出于对理论与批评正离文学越来越远的担忧和顾虑,陈晓明、程光炜、陈思和等先已负盛名的批评家们开始反思过往批评方法或风气,重新强调文本和“文本细读”的重要性。“版本批评”作为一种借鉴融合了中国古籍版本学、西方现代校勘学乃至现代文学“新书版本学”所倡导之学术资源的批评方法与范式,首先,它将研究对象紧扣作品本身,以个案方式考证大量新时期重要长篇小说创作、发表、出版及再版(甚至定稿)全过程。比如要弄清张扬《第二次握手》的版本源流,就要先考证从1963年创作的《浪花》到1974年《第二次握手》五版手抄本的出版前史,进而才能对比厘清从定名《第二次握手》后的初版本(1979年)到重写本(2006年)再到终极本(2012年)的版本谱系及其流变,才能厘清准经典作品诞生、修改及成长(或衰退)的历史背景与史实。其次,它将批评或评论的对象聚焦于不同文本的“异文”,严格意义上说,只有多版本间文本“异文”才是版本批评的直接对象。而这些深藏不同文本深处“异文”的发现和呈示,则有赖于作为一种文本细读之法的版本汇校,这些异文甚至还能廓清过往作品研究误区及矫正过度阐释现象。如《白鹿原》中对小娥与黑娃及鹿子霖间的性描写,初刊本中删去了很多细节叙述,虽然达到了编者所要求的稍显含蓄和委婉效果,但与作者在原初手稿中所要呈现的小娥作为一个敢爱敢恨敢为妇女形象的本来意图并不相符,所以不同版本异文对于人物形象塑造和性格阐释是有差异的。再次,“版本批评”还将研究视域转向多版本间的文本演变,大幅修改后的作品多会产生文本变异,从而与作者意图文本间出现微妙裂隙。总之,无论是微观层面作品版本个案研究,还是宏观

层面的影响因素、核心现象、特征规律及文本演变的总结阐释,“版本批评”将当代文学过往研究集中于对作家作品主题、文本内容分析与创作手法等的揭示,转向作家修改或作品重写并再版的版(文)本研究,进一步丰富了当代文学研究的问题与方法论意识。

最后,还可促进文学批评与文学史叙述的精准化。当代文学文本汇校与整理之所以与文学批评紧密关联,是因为它是指向历史化的文学批评。当某部长篇小说新作在杂志初刊,甚或由出版社以单行本形式初版时,类似“作品研讨会”式的及时、现场文学批评,因为还没有产生版本差异,其版本所指自然很明确,这种“现场式”的文学批评并不涉及作品版本及其文本整理。但当作品因作家主动修改或被动删节等原因出现众多修改本时,在或长或短的历时语境中,历史化批评的问题就会出现。“要么版本笼统所指,就是从众多版本中任选一个版本以此统指作品;要么版本互串,将对一部作品某个版本阅读印象强加于另一版本,这种现象严重影响了文学批评的严谨性。”(罗先海,《加强新时期》3)甚至文学史叙述过程中,在评价某部作品前,几乎没有对具有文本差异的作品进行版本变迁史叙述,更谈不上对一部小说的不同版本作具体论析。当前,已有一大批新时期重要长篇小说(甚至包括网络文学作品)有了版本变迁事实,只是时间太近,作者、读者和研究者暂时还没有意识到其重要性。加上不少研究者学术积累中版本意识的欠缺,导致文学批评和文学史叙述过程中的版本混乱和模糊,对此,我们应补上“版本批评”的学术课,推动文学批评与文学史叙述的科学性和精准化。

结 语

对新时期长篇小说开展版本批评,相较古典文献及现代文学的版本研究,不仅因时间切近易于获取资料,版本研究亦能成为一种文学批评或文学史叙述的视角和方法;更为重要的是,还能后世经典作品传播接受积累准确的版本资料。若待新时期重要作家的长篇名作成为“古籍”后,才意识到其版本价值,到时再回过头来进行版本发掘、汇校、整理和研究,可能会更费时费力。而且,新时期长篇小说的版本变迁及文本差异,并不是

脱离作品内容的无关紧要的修补,很多修改异文都紧密关涉作家创作与修改心理,作品思想艺术,是体现时代与历史变迁的重要隐秘信息和资料。对新时期重要作家的长篇作品进行必要的版本搜集、异文汇校和整理研究,还存有较大学术空间和价值,是一项益于文学批评、文学史重写及重要作家作品历史化、经典化研究的工作,应引起学界重视。

注释 [Notes]

① 参见鲁海:《“书话”与新版本学——悼念唐弢同志》,《图书馆杂志》3(1992): 54—64;武晓峰、徐雁平:《〈晦庵书话〉和新书版本学》,《图书馆》6(1998): 63—67;徐雁平、武晓峰:《是否有新书版本学》,《中国图书馆学报》1(1995): 78—80。

② “实质性异文”相对于“非实质性异文”而言,是指在思想内容方面有所不同的文本异文;后者则是指在拼写、标点以及词形分合等呈现形式上有所不同的文本异文。这里借用的是英国书志学家 W. W. 格雷格的说法,参见苏杰编译:《西方校勘学论著选》。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

③ 该作初刊、初版本小说原标题为《天堂蒜薹之歌》,题名较含蓄,似有歌颂,其实极具反讽意味;1993年,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推出时标题修改为《愤怒的蒜薹》,很明显,修改后的标题对作者愤怒情绪的传达更为浓烈,情感倾向更明显,立场态度更鲜明;时隔八年之后作品再版,作者又隐藏了这种标题中浓烈的情感宣泄,将小说题名重新改回为含蓄且具有反讽意味的《天堂蒜薹之歌》,并沿用至今。

④ 新时期以前的当代文学中,只有“全国少年儿童文艺创作奖”(1954年)属于全国性文学奖,长篇小说专项奖并未诞生。这一阶段长篇小说获奖的只有《太阳照在桑乾河上》(丁玲)和《暴风骤雨》(周立波),两部作品分获“斯大林文学奖金”(苏联)二等奖和三等奖。这一时期“文学评奖”的“缺席状态”使其并没有成为一种影响长篇小说生产和修改的体制性因素。新时期后这种情况得到了整体改变,最早是在1978年,《人民文学》组织了“全国优秀短篇小说评选”,拉开了新时期全国文学评奖大幕,之后从官方到民间相继出现了各类文学体裁的全国性评奖。如“官方奖”有中国作协设立的长篇小说创作专项奖“茅盾文学奖”、1991年中共中央宣传部主办设立的“五个一工程奖”、1993年新闻出版署主办设立的“国家图书奖”、2000年中国作协设立的“冯牧文学奖”等。“民间奖”则主要有《小说月报》主办的“百花奖”、《小说选刊》主办的“《小说选刊》奖”、《十月》主办的“《十月》文学奖”、《当代》主办的“《当代》文学奖”、人民文学出版社的“人民文

学奖”等。

⑤ 2015年花城出版社出版了《一个人的战争》“20周年纪念珍藏版”,以纪念这部中国当代女性文学代表作诞生20周年。其中正文前用了四个页码刊登了该作所有不同版本图书影信息,但唯独欠缺1994年甘肃人民出版社的初版本图书影。其实并非花城出版社粗心遗漏所致,实乃作者自己一直不愿承认初版本,故而未收入该版图书影。

⑥ 《繁花》从线上网络创作到线下纸本衍生的详细修改与版本演变及其相关学术问题,参见罗先海:《当代文学的“网—纸”互联——论〈繁花〉的版本新变与修改启示》,《当代作家评论》3(2018): 23—32。

⑦ 2016年《文艺报》曾开设“回到文学本体”系列笔谈,在“笔谈之八”中主持人何平曾指出“文学批评回到文学本体”的重要理论及实践意义。参见刘艳:《文本细读:回到文学本体》,《文艺报》2016年7月27日第2版。

引用作品 [Works Cited]

黄发有:《以文学的名义——过去三十年中国文学评奖的反思》,《社会科学》3(2009): 161—170。

[Huang, Fayou. “In the Name of Literature: Reflections on Chinese Literature Awards in the Past 30 Years.” *Social Sciences* 3(2009): 161—170.]

何启治:《文学编辑四十年》。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年。

[He, Qizhi. *Forty Years as a Literary Editor*. Beijing: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2001.]

虹影:《K—英国情人》(修订说明)。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2013年。

[Hong, Ying. *K: A British Lover (Revision Notes)*. Nanjing: 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Press, 2013.]

金宏宇:《中国现代长篇小说名著版本校评》。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

[Jin, Hongyu. *A Critical Review of Editions of Chinese Modern Novels*. Beijing: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2004.]

——:《当代文学的版本》,《光明日报》2004年2月4日第7版。

[--- “The Editions of Contemporary Literature.” *Guangming Daily* 4 February 2004.]

林白:《一个人的战争》。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1999年。

[Lin, Bai. *One Man's War*. Wuhan: Yangtze River Literature and Art Press, 1999.]

李松睿:《自我批评与正义继承的道路——新旧版〈心灵史〉对读》,《现代中文学刊》3(2018): 72—82。

[Li, Songrui. “Way to Self-Criticism and Justice Inheritance: Old and New Editions of *A History of the*

- Mind.*” *Modern Chinese Journal* 3(2018): 72-82.]
- 罗先海:《跨媒介叙事的互动与裂隙——以〈活着〉电影改编、小说修改为考察中心》,《文学评论》4(2020): 215—223。
- [Luo, Xianhai. “Interaction and Fissures of Cross-Media Narration: — On the Cinematographic Adaptation and Textual Revision of *To Live*.” *Literary Review* 4(2020): 215-223.]
- :《加强新时期文学的版本研究》,《中国社会科学报》2020年5月11日第3版。
- [--- “Strengthening the Research on the Editions of Literature in the New Era.” *China Social Science Daily* 11 May 2020.]
- 王得后:《世纪末杂言》。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1999年。
- [Wang, Dehou. *Miscellany at the End of the Century*. Fuzhou: Fujian Education Press, 2004.]
- 王风:《现代文本的文献学问题——有关〈废名集〉整理的文与言》,《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3(2004): 45—64。
- [Wang, Feng. “On the Philology of Modern Texts-Text and Words on the Arrangement of the *Fei Ming Collection*.”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Studies* 3(2004): 45-64.]
- 吴秀明 章涛:《“获奖修订版”生成与当代主流文学话语的规范/妥协机制——以〈沉重的翅膀〉和〈白鹿原〉的修订为例》,《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2015): 78—89。
- [Wu, Xiuming, and Zhang Tao. “On the Regulating and Compromising Mechanism of Chinese Contemporary Literature: — Taking the Revisions of *Leaden Wings* and *White Deer Plain* as Examples.” *Journal of Tsinghua University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Edition)* 1(2015): 78-89]
- 张丽军:《文学评奖与新时期文学经典化》,《南方文坛》5(2010): 26—29。
- [Zhang, Lijun. “Literary Awards and Literary Canonization in the New Era.” *Southern Literary World* 5(2010): 26-29.]
- 章涛 吴秀明:《当代文学版本生产与版本研究的实践》,《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1(2013): 117—133。
- [Zhang, Tao, and Wu Xiuming. “The Practice of Edition Production and Edition Research in Contemporary Literature.”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Studies* 11(2013): 117-133.]
- 张英:《文学的力量——当代著名作家访谈录》。北京:民族出版社,2001年。
- [Zhang, Ying. *The Power of Literature: Interviews with Famous Contemporary Writers*. Beijing: Nationalities Publishing House, 2001.]

(责任编辑:赵勇)

